

从仪式到纪录： 现代体育的本质

(美) 阿伦·古特曼/著

花勇民 钟小鑫 蔡芳乐/编译

袁 旦/审译



FROM RITUAL TO RECORD
THE NATURE OF MODERN SPORTS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北京体育大学“211 工程”三期“世界体育发展”重点学科建设项目资助出版

从仪式到纪录：现代体育的本质

(美) 阿伦·古特曼 著

花勇民 钟小鑫 蔡芳乐 编译

袁 旦 审译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策划编辑 力 歌
责任编辑 张 力
审稿编辑 苏丽敏
责任校对 罗乔欣
责任印制 陈 莎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01 - 2012 - 0326

Copyright © 2004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This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edition is a complete translation of the U. S.

edition, specially authorized by the original publisher,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从仪式到纪录：现代体育的本质 / (美) 古特曼著；花勇民等译. - 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12.7
ISBN 978 - 7 - 5644 - 1030 - 8

I. ①从… II. ①古… ②花… III. ①体育运动 - 研究 - 美国 - 现代 IV. ①G817. 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49710 号

从仪式到纪录：现代体育的本质

(美) 阿伦·古特曼 著
花勇民 钟小鑫 蔡芳乐 编译

出 版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海淀区信息路 48 号
邮 编 100084
邮 购 部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读者服务部 010 - 62989432
发 行 部 010 - 62989320
网 址 www. bsup. cn
印 刷 北京市天宇万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5

2012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 5000 册

定 价 30.00 元

(本书因装订质量不合格本社发行部负责调换)

1927年，哲学家马克思·舍勒^{〔1〕}在给一本早期运动心理学著作作序时曾感叹道：“如今几乎没有哪一种国际现象能像体育这样值得学者做深入的社会学和心理学的研究。虽然体育的范畴一直在无限地扩大，体育的社会地位也在无限地提高，但体育的内涵却很少得到严肃的对待。”50年后的今天，体育仍然位于最受议论但却又最少被理解的现象之中。公众之所以对体育不甚了解，原因之一是公众对体育的熟知似乎使体育的意义显而易见，但事实并非如此；另一个原因是研究体育的哲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主要只和业内人士交流，其著书立说的读者对象并非普通民众。

我希望本书能向读者系统地阐述现代体育的本质，并向他们呈现出美国体育项目的独特之处，以及与其他项目的相似之处。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我尝试界定游戏、有组织的游戏、竞赛和体育之间的关系；试图展现现代体育与原始体育、古代体育与中世纪体育的不同之处；说明现

〔1〕 马克思·舍勒（Max Scheler，1874—1928），德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也是哲学人类学的主要代表。舍勒在现代西方哲学中占有特殊地位。他本人也常常被看作是一个“谜”。这是因为，这位被称为德国哲学界自谢林以来的又一位神童，在其30年学术生涯中几乎涉猎了现象学、伦理学、宗教哲学、知识社会学、哲学人类学、形而上学、社会批判和政治思想等现代精神科学的各个领域。

代体育产生的社会条件；对美国特有的体育项目——棒球和美式橄榄球加以评论；最后，尝试着深入分析美国人更偏爱于团体运动而非个人运动的原因。

我希望本书不仅能引起体育界专家的兴趣和关注，也能引起普通民众的兴趣和关注。我尽最大的努力阐述、解释和说明问题，既不使其复杂化，也不使其简单化。如果我成功了，我大部分的功劳应归功于我身后众多同事和朋友们。他们赋予了“学术界”（Community of Scholars）新的含义。对于他们的种种帮助，我深表感激。我要感谢 Ralph Beals、Yves 和 Nicole Carlet、Haskell Coplin、Friederike Dewitz、Peter Graham、Robert Grose、Ommo Grupe、Herbert 和 Mary Jim Josephs、Gerald S. Kenyon、Hans Lenk、John Loy、Tracy Mehr、Edward Mulligan、Russel Nye、Jack Salzman、George Stade、David Turesky、Horst überhorst、Harod VanderZwaag。此外，Doris Bargaen、Jan Dizard、Frederick Errington 和 John William Ward 通读了书稿，并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德国体育科学基金会^{〔1〕}和美国全国人文学科捐赠基金会^{〔2〕}对本研究提供了大量的经费资助，在此一并感谢。

阿伦·古特曼

1978 年 1 月

〔1〕 Deutsche Forschungsgemeinschaft

〔2〕 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

中文版序

1969年初的寒冷的一天，我在柏林奥林匹克体育馆观看了一场足球赛。那时，我是一名富布莱特交换教授，在德国波鸿（Bochum）的鲁尔大学（Ruhr University）执教。在那以前，我从来没观看过一场足球比赛，五万德国人共同欢呼的场面和喧闹声对于我来说是新奇的。确切地说，这样的场面对我而言是一种异文化现象。那时我就决定研究美国体育与欧洲体育之间的差异。为什么欧洲小男孩是踢足球而美国小男孩却是打棒球和橄榄球呢？关于美国文化和欧洲文化之间更为深刻更为重要的差异之处，这一运动项目的差异能够告诉我们些什么呢？那一瞬间，这些问题不断地涌现，由此有了9年后《从仪式到纪录》的出版。

在我开始为《仪式与纪录》做认真的研究以前，我还必须先完成那时我正在写的一本书。那是一本研究美国犹太作家的书，1971年出版了，在那之后，我准备好了研究美国体育与欧洲体育间的差异。我开始进入到一个对于我来说全新的领域，那时我在马萨诸塞州阿默斯特大学的家中。我阅读的第一本书《体育、文化和社会》（1969），是由约翰·W·罗伊（John W. Loy）和杰拉尔德·S·肯扬（Gerald S. Kenyon）编辑的一本文集。那时我尝试着阅读该书参考文献中所列出的所有学术著作。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因为罗伊和肯扬都是那个时期最重要的体育社会学家。为了文集的编辑，他们搜集了体育研究中的最优秀的作品。我努力读完《体育、文化和社会》中所有的参考文献（除了两篇找不到的文章之外），并且努力在回到德国之前完成，因为作为富布莱特交换教授，1973年到1974年间，我需要回到德国。那年我在图宾根（Tübingen）执教，广泛地扩展了研究的历史范畴。充分利用大学图书馆以及体育学院资料室中的资源，我研究了原始体育、古代体育、中世纪体育和现代体育。正如教育专家所说，这是一次“学习的体验。”1976年末，研究完成了，我改变了我的整个计划。我意识到，真

正重要的文化差异并不在于我之前所想的欧洲与美国之间的差异，而是在于过去与现在之间的差异。换句话说，我意识到，17 世纪末 18 世纪初源于英国的现代体育，与之前任何时期的体育在结构上都存在着极大的差异。差异之处并不在这里与那里，而在历史与现在。因此，我按时间顺序组织《从仪式到纪录》而不是按地域差异。我系统地对比了现代以前的体育和现代体育，并得出了现代体育的 7 种特征。我认为，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本书的主旨，那就是——现代体育具有 7 种特征，这 7 种特征一起定义了现代体育。作为“理想形式”，现代体育是世俗的、平等主义的、理性的、科层化的、专门化的、量化的并且对纪录的追求特别痴迷。（很多年后，我意识到，我本可以将科层化、专门化以及量化归入理性化中，这就只剩下世俗主义、平等性、理性化以及对纪录的追求四个特点，但是要重新修订已经太晚了，我在其他书中已经使用了之前的 7 个特点的说法。）

我在《从仪式到纪录》的前半部分对此论题进行了阐述，被广泛地接受了，当然也被广泛地批评。本书的第二部份，要稍微逊色些，对欧洲体育和美国体育之间的差异进行了后续讨论，当然，这是我在 1969 年原本非常感兴趣的话题。希望能使读者更专注于现代体育特征部分，我加上了一个副标题《现代体育的本质》。

我没有意识到我研究的范围是如此地有限，尽管这要比我最初在 1969 年所想的要广泛地多。那时，我对美国和欧洲的历史非常了解，但我对世界其他地区真的知之甚少。我知道一点关于 20 世纪中国的政治史，但是我却并未认识到中国体育史的丰富多彩和十足魅力。这一无知绝对是《从仪式到纪录》的缺陷之一。（另一缺陷是对文艺复兴时期欧洲体育的忽视。）

1980 年夏，在为期 6 个星期日本讲学期间，我开始弥补我在亚洲文化方面的重大缺陷，那时，我妻子桃瑞丝·巴根（Doris Bargen）开始她作为日本历史与文学学者的职业生涯。从 1985 年至今，我和她每年至少有一个月呆在日本。在此期间，我学习日语并能够阅读体育史。2001 年，我与李·汤普森（Lee Thompson）一起出版了一本日本体育史，李·汤普森的日本体育知识远超于我。

那时，看着我那几千页关于体育的笔记，我决定以那本某种意义上开启我事业的书来结束我作为一名体育历史学家的生涯。我决定写一本关于世界体育的社会文化史，从体育产生的时期开始一直到现在。成果就是《体育：第一个五千年》（2004）。副标题具有讽喻意味。我用副标题来承认，没有那个人可能如此渊博可以完成这么一个宏大的命题。

我是否取得了部分的成功，应由他人来评判，但是我可以说的是，《体育：第一个五千年》所做的研究给了我一个机会探索中国体育史的广阔天地，从史前足球赛到唐朝的马球赛到20世纪早期的篮球联赛再到当代中国男女运动员所取得的非凡成就。（很遗憾地是，这本书是出版于中国成功举办2008年奥林匹克运动会之前。）

当然我并不是中国体育的权威人士，但是我能够回应苏珊·布朗诺（Susan Brownell）这一真正权威人士所做出的批评。她指责欧洲和美国体育史学家可耻地忽略了亚洲体育。她指出，用英语、法语、德语和意大利语写作的学者写出了一整个图书馆关于古希腊罗马体育的书，却仅仅写了一点关于20世纪以前中国体育的书籍和文章。当然，她是对的。情况非常糟糕，以至于当我为《体育：第一个五千年》做研究的时候，我不得不通过艰难地阅读一本日本出版的关于中国体育的书来弥补我研究的不足。我回应布朗诺的批评，明确地告诉她，在《体育：第一个五千年》一书中有很多内容是关于古代中国和日本体育方面的，如同我写关于古希腊罗马体育一样。我对此很自豪。

更重要地是，我很感激花勇民教授将《从仪式到纪录》翻译成中文。他给了我一个很珍贵的机会，一个承认该书文化的局限以及间接地偿还对中国学者所欠下的债务。

阿伦·古特曼

阿默斯特，马萨诸塞州

11月29日，2011年

译 序

袁 旦

【编者按】为了使读者能够更好地阅读和理解本书的内容，译者请国内著名学者袁旦教授特为此书中文版撰写译序，此文以《时代呼唤人文体育价值观和工具理性价值观批判——从一本西方体育学者著作说起》发表在《天津体育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

—

阿伦·古特曼教授的《从仪式到记录：现代体育的本质》一书是一本主要从文化人类学视角探讨、揭示现代体育本质的体育学著作，1979年出版后被翻译成法、德、意、日、韩等文字在各国出版。2004年，本书出版26年后，作者对原文未作改动，仅添写了一篇后记，又再次出版。这在今天这个信息爆炸时代，新的体育理论著作层出不穷，它依然醒目地立于其中，足见当年作者对人类体育所立之论的价值。笔者是在7年前（2005年春）听说本书的。那是今天本书主译者花勇民博士^{〔1〕}赴瑞士高访归来与我首次会面时谈到的。

我们能够在分别两年后首次会面便认真谈起本书，绝非偶然。首先，当然同这一著作本身有关，勇民告诉我他在瑞士期间与多位体育学术界、体育管理机构重要人士接触中，他们都介绍到这本书，而且之间的讨论还直接涉及到本书的观点、内容。其次，当然是我们自己的缘故。这与此前多年我同他以及多位体育管理研究方向的硕士博士研究生在上课下的讨论有关，同我们讨论建立的共识有关。我们讨论有一个共同的前提：现代

〔1〕 本书由花勇民博士率文化人类学硕士研究生钟小鑫、英国文学硕士研究生蔡芳乐翻译。

体育的管理是现代社会生活中一个特殊活动领域中的管理活动，从逻辑上讲，它是现代管理学一般原理在这种活动中的应用，所以不关注、不去把握体育学理论的进展，这和不关注、不去把握现代管理学一般原理的进展是一样的，都谈不上什么体育管理研究，谈不上什么正确、科学的体育管理。用一句显得粗鲁的话来说：“你不懂体育，奢谈什么体育管理！”此其一。其二，在我们看来，现代体育离不开管理，离开了管理就不可能有现代体育这种规模如此宏大的人类文化活动，而现代体育管理的正确理念却离不开正确的体育学理论，确切地说是离不开管理者对人类体育的正确理解、热爱和因此从他高尚人格和机敏之中升腾出的使命。总之，离不开对人类体育的正确认识或理解，离不开体育学。基于此，所以我们一向不敢不关注体育学理论的进展，我们聚首每每言及体育管理和体育的发展总要谈到体育学。其三，尤其在我们看来，现代体育发展是关系整个现代社会文化发展的问题，因而也是对人们的生活和生命有着不容忽视的深刻影响的问题。所以，人们对现代体育的理解和认识本身就是社会文化问题：它一贯在社会结构各个层面左右着人们的生活与体育的关系；因而，反过来，这种关系又一贯从这个方面影响着整个社会与文化的发展。但是，我们这方面的研究这些年来却恰恰处落在体育学术研究这个圈子的边缘上，相当薄弱。像古特曼这样把对人类体育的研究推进到像他这本书的题目《从仪式到记录：现代体育的本质》所表明的那样，在文化人类学的层面来揭示体育的本质回答体育“是什么”或“应该是什么”的问题，这种有影响的成果，至少我是未曾见到的。正因为此，我们分别两年后，一见面就自然要谈到这本书了。

二

现在看来，中国体育和体育学术的发展确实需要我们认真反思了。而且在我看来，若是反思就不逃出世纪末（1999）费孝通先生给一套社会学教材译丛作序时提出的“文化自觉”的问题。先生说：

21 世纪不会是一个平静的世纪，全球化增进了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之间的接触与交流，同时在相互碰撞中也隐藏着矛盾和冲突。我们需要了解其他社会的制度、文化、价值观念、行为规则，也需要认识我们中华文化的发展历史和精髓，逐步在比较研究中更深刻认识自己与他人，真正做到

中国人的文化自觉。^{〔1〕}

稍后 2002 年，先生在给一套人类学经典译丛作序时更说：

我曾经用“文化自觉”来形容中国文化在新世纪中所要承担的使命，“文化自觉”就是要在了解自身文化的基础上展望世界，对于自身在世界之中的地位“有自知之明”。^{〔2〕}

人类体育的研究早在上世纪中叶就推进到文化人类学的高度和深度，但就我们的情况而言，不说那时文化人类学在中国的人文、社会学术研究的合唱中遇到了长达多少年的一个休止符，就说体育是不是文化，直到今天也还打着问号。譬如，尽管中国体育已有那么多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但对体育和体育人的所谓“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讥讽说法，在体育的业内外至今仍不绝于耳。在我看来，人类文明已经来到了 21 世纪的今天，我们生活其中的这个世界居然还会发生这种鄙视体育的事情，是不是说明这个世界有问题呢？体育真的不能登文化大雅之堂吗？时至今日，说起文化，人们心中竟还不把体育置于其中给它个合适的地位，动辄还把体育玩笑成本能般低级之列，那么这样所说的文化算是什么文化（当然也是文化）呢？我看，这无疑是我们生活其中的这个世界或者说现代体育赖以存在的文化环境对自己的一个讽刺。于是，我感到，我们似乎因此同本书的作者走到一起了。你看本书的前言，作者开宗便道：

1927 年，哲学家马克斯·舍勒在给一本早期运动心理学著作做序曾说道：“如今几乎没有哪一种国际现象能像体育这样值得学者做深入的社会学、心理学的研究。虽然体育范围一直在无限地扩大，体育的社会地位在无限地提高，但体育的内涵却很少得到严肃的对待。”50 年后的今天，体育乃位于最受议论但却最少被理解的现象之中。公众之所以对体育不甚了解，原因之一是公众对体育熟知似乎使体育的意义显而易见，但事实并非如此。^{〔3〕}

作者此说至今又过去了 30 多年，我们的所遇所见仍是那样的相类似。这显然说明，实际上我们生活其中的这个世界的文化一贯在质疑着人类的体育。这是不是说明，现代文明自身内部，体育的背后一直存在着什么问题，从而影响着体育也影响着整个社会文化自身呢？

〔1〕《高校经典教材译丛·社会学》总序，华夏出版社，2000 年

〔2〕《现代人类学经典译丛》总序，华夏出版社，2002 年

〔3〕〔美〕阿伦·古特曼，《从仪式到记录》前言

这里实际上提出了一个各国、各民族共同面对的文化自觉的课题，反思、追问和评价体育同社会文化间关系的课题。这是对体育和社会文化发展有着不容忽视深刻影响的课题。这个反思、追问和评价尤其要在不同历史和现实的文化之间相互比较中进行，才有利于真正提高我们对体育的文化的自觉性，得以自知之明，才对各种社会文化以及其中的体育的发展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三

一旦为此而进行这种反思、追问和评价，尤其要在不同类型的文化间的比较中进行，这当然要有一个合理的评价标准。看来，这个标准肯定同我们对体育本质的认识或主张联系在一起。

因为，从逻辑上讲，同一切事物一样，体育的本质作为一个人认为它之所以是体育而不是别的什么的理由，就是他认为体育在同一切其他事物的相互比较和相互联系中而存在的根据。所以，它是人们的体育价值观念和行动性质的集中反映。这在不同的人或不同性质的主体（例如个体、社会组织和国家）那里往往很不一样。你给体育下的定义不同，就是你认为它存在的理由和根据不同，于是同体育的关系便也不同了。譬如：对于个体而言，是体育同他的生活；对于把握权力和公共资源的政府官员而言，是体育同其行政辖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对于体育企业的业主而言，是体育同其企业的经营方向和内容性质；对于体育研究者而言，是体育同其选题、研究方向和内容的性质；对于大众传媒而言，是体育同他要对公众传播或鼓吹什么的方向和内容的性质，等等就都不同了，体育因此在这些关系中的地位 and 命运就都不同了，社会文化的命运（至少是它的样态）也不同了。所以，由于体育本质的认识或主张（不论人们自觉与否）带来的社会生活中体育的地位、命运，以及由此造成的社会文化的命运，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它并不是理论家、伟人、圣人说它是什么就是什么，也不是官方权威文件说几句大话就能规定下来或交代清楚的。它以人的生活境遇为转移（比如穷人和富人），它是人们生活本身的问题。不过说清它却要有理论。尤其，要把体育的发展导向正确合理的方向和路径，如果要使体育不致成为亚当·斯密所说的“理性人”的无理性冲动行为，则就必须理论。因此，它这才是一个既理论又实践的问题，它是“理论——实践”关系问题的总根源或总前提。而联系我们体育的历史讲，我

们过去究竟是怎么理解或认为体育的本质和它在中国社会存在的理由和根据的？今日中国的社会转型，体育赖以存在的政治、经济条件已从根本上改变，则这个既理论又实践的问题、社会文化观念问题是不是因此便十分突出地摆到了我们面前？答案显然是肯定的。

可见，正因为人们种种体育本质的观念和理论对他们生活和生活中的体育实践都会产生具有决定性的重要影响，显然不是现实生活中任何一种体育本质的理论或主张都可以当成标准的，否则体育究竟应该在人们生活中居于何种地位，社会文化因此究竟应该怎样发展就更没有标准了，简直成了一种“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事，根本无法比较，也无需比较，这就离开文化自觉更远了。所以，以上分析只说明了一点：虽然进行这种研究离不开对于种种自觉或不自觉的体育本质的理论和观念的研究，但更要在不同类型文化的比较中进行反思、追问和评价，找到一个对于公婆之理都可以进行合理评价的更高的理、更高的标准。而且，这个标准一定是有的。

因为，朝宏观方向看，现代体育是一种超越种族、民族和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传统差异的跨文化的存在；而且朝微观方面看，它在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或一个有限地域（社区）中，也是一种超越不同性质人群的亚文化差异的普遍存在。所以，这种标准必然是人性深处的共同本质和需要所决定的，是它所决定的人们对现代体育的普遍价值评价，就是基于这种普遍价值评价之上的最普遍、最一般、最抽象的现代体育的本质。只要我们承认这一点，事情就是这样。

我以为，就此而言，古特曼在这方面的工作是富有成效的，他在《从仪式到记录：现代体育的本质》一书中一反我们惯见著述中的方法：每每论及体育的本质（尤其在教科书中）总是把各位大家、名人和权威的理论（甚至只言片语）当作预设的前提来就体育论体育，说体育的本质“是这”、“是那”，然后综合一下、平衡一下给学生端出一个定义。人们无法从中得知它同人的生活 and 生命的真切关系，因而不知它有何用处。古特曼在书中就像现象学所说的“回到事实本身”，通过叙述古今一些个体和族群生活中的本能游戏和祭祀仪式、艺术表演和体育竞赛的史实故事，从叙述过程中显现出人性深处那种创造古今体育的原始思维，正是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抽象和概括出了现代体育的本质和本质特征。他这本书的标题就是“现代体育的本质”，他仅从体育属于人的游戏这一不证自明的常识出发，在叙事中展示出人类体育从本能的 game（play）到人类有组织的游戏

(game) 这个体育起源的必然性, 展示出古代或前工业社会的体育(如果说是体育的话) 到现代体育这种文化演进的历史必然性, 从而给出了现代体育本质的定义。古特曼说, 现代体育是一种普遍且特殊的非功利性身体竞赛。^{〔1〕}

在我看来, 很明显, 古特曼在书中揭示的现代体育本质定义和与此相联系的现代体育 7 个本质特征, 就是我们所说的在不同文化间的比较中进行反思、追问和评价的标准。

四

我对古特曼现代体育定义中所说现代体育的非功利性最感兴趣, 书中他所揭示的现代体育的 7 个本质特征可以说都在说明这种非功利性活动区别于以往各时代体育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所在, 当然是重要的。我感到, 以现代体育的非功利性这一根本性质来考察现代体育, 我们甚至直接可以在现代社会的“现代性”^{〔2〕}这种复杂联系中把握现代体育在人和社会生活中应有的地位和它对于人和社会应当具备的本质的功能和本真的价值。

我们生活在其中的这个在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左右下发展的现代社会, 分工又分层, 简单地讲: 分工使人们成为各职业领域的专业劳动者, 炼钢的不织布, 织布的不炼钢……分层至少有了蓝领和白领, 蓝领的动体力, 白领的动脑力(当然不能忘了还有发号令的和听号令的)。这样纵割横切, 构成了现代社会各种职业活动领域、各种专业劳动组织, 有人形容这把社会撕成了碎片。当然, 从整个社会看, 这些碎片又形如有机生命体中的一类有别于血液循环和神经系统的器官组织, 胃是胃, 肝是肝, 各干各的, 谁都替代不了谁, 但又谁也离不开谁。用涂尔干的讲法, 这是社会的有机团结,^{〔3〕} 他们要相依为命。但说到其中一个个活生生的人, 他们就被碎片整苦了, 为了活命, 他们一概起码都要在一个不管什么碎片中从事一种职业的专业化劳动, 从而获得生存所必须的物质资料, 总之, 都要从事一种功利性活动。显然, 如果一个人为了活命而不得不一辈子只从事这种功利性活动, 则不客气地说, 固然他是一个人, 但他至多不过是以人的聪明活

〔1〕 [美] 阿伦·古特曼, 《从仪式到记录》第三章

〔2〕 汪明安, 陈永国, 张云鹏主编《现代性基本读本》,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5 年

〔3〕 [法] 埃米尔·涂尔干《社会分工论》,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0 年

了动物般的一生。于是，这就无异于他不得活命其中的社会碎片不仅把他囚禁了，而且还把他抽象化了。就是说，一个人不得不活命其中的碎片只对他专业不专业、专业劳动效率高不高感兴趣，不考虑别的，撇去他作为一个人的七情六欲，把他抽象成工人、医生等等，总之，他（她）只是一个从事不论什么职业的职业人。因而在其中，人就不再是一个活生生有血有肉、有知有情有意的具体的人、完整的人。用马克思异化理论来说，他只是作为一个工人，而不是人而存在的，^{〔1〕}他从来就不是一个完整的人，他从来就没有也不可能占有和享受自己作为人的人性本质——自由。并且伴随着社会现代化的进程，这种情况还越发严重起来。当然，任何被剥夺了自由的人都不会就此甘心，所以就像马克思说的，他一有可能就像逃避鼠疫那样逃避劳动。^{〔2〕}但问题是，怎么办？怎样使自己人性的自由本质得以确证，从而真正占有和享受作为人的自由本质？怎样使自己恢复人的完整性？当然一个重要的途径就是只要不为生存问题所困，一有可能，哪怕是短暂的，人就在人性自由本质力量推动下，进行从本能达于文化的种种非功利性活动，从而为自己的生活和生命创造价值和意义，从而在种种非功利活动中占有和享受人性的自由本质，从而使自己的生命成为一种向着未来开放的、有着无限可能性的、自由的过程。

我以为，这正是现代体育以其非功利性本质为根据，从而在现代社会生活复杂联系中，得以产生和发展的根据。这种根据直接源自人性的自由本质。人类体育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人类的原始时代，它应当受到尊重、必须受到尊重。因为，人作为一个类的存在，自其诞生和在远古蛮荒的时代，我们的原始先祖在挣脱自然的控制而成为人这一方面，除开谋求生存的劳动，最初或首先可能的行动看来就是在身体上做“文章”，创造身体文化，创造身体运动文化（既手舞足蹈，又歌咏呼号），我把这称作“原始身体运动文化”^{〔3〕}或“原始身体运动文化综合体”，其中一开始就包含着体育的因素或原始的体育。人把从自己动物性中继承的本能游戏（play）上升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42卷第104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

〔2〕同上，第94页

〔3〕原始身体运动文化。原始时代人们以身体运动方式进行的非功利性的活动，以此为生活和生命创造价值。故是文化而非本能。它存在于远古时代人的神圣祭祀仪式和世俗生活之中，容体育和舞蹈、歌咏、音乐演奏、戏剧、杂技等各种表演艺术活动的因素，故又可称原始的身体运动文化综合体。而今日分门别类的所有这些活动都是进入文明时代后，在文化演进过程中从中分化产生的，近年这些活动又相互借鉴，出现融合之势。

到有理智的有组织的人的游戏（game），甚至还打扮自己、创造仪式，在游戏中对自己进行审美，在审美中占有和享受人性的自由本质。我看，相对于为谋求生存的劳动这种功利性活动而言，所有这一切和后来从中分化产生的体育等等，简直就是人的非理性的狂野的身体运动的力能蛊惑人的意识而共谋的一种为自己生命创造价值和意义的非功利性的活动。它同人的本质是那样最直接、最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它是人的自由本性发动的活动，在现代它是人的自由本性反抗劳动专业化剥夺人的自由、把人碎片化（抽象化）最积极的一种力量。并且从原始到现在，到永远。难怪，200多年前，诗人、哲学家席勒就说：“只有当人在游戏时，他才是完整的。”〔1〕

多年前，我们在讨论西方体育时我曾说过，如果我们以社会学的观点视其历史，西方现代体育的成长和发展方式与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之不同也许就在于：它在很大程度上是独立于国家或政府的，是从西方现代资本主义市民社会的民众生活中自发地自下而上成长和发展的产物，是市民社会生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它是市民社会中一种有别于前现代社会传统体育的新的生活方式。它与传统西方体育一个重要的不同就在于：它终于彻底地摆脱了依附于社会生活中其他活动（如宗教祭祀、节日庆典、劳动生产和军事训练等等）而存在的状态，成为一种独立的实践登上了人类社会生活舞台，成为了工业文明社会的一种城市文化。特别是它更成为了整个社会大系统中的一种制度化的文化活动，并且形成了与工业社会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相适的制度。因此，如果我们以现代系统论观点视其结构，则这种制度化的文化活动作为社会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它应该是一种全社会的通体性结构，或者说发展成为社会有机体中的通体性结构是它结构成长的方向：一个个活生生的人，他们的人性自由本质的力量，突破社会分工的禁锢——消除分工使他们失去自由和把他们抽象化、碎片化——的冲力和意志，是推动这个结构形成的始原的动力；越来越多的人投入体育从事对自己生活和生命进行创造，并使这种活动成为每一个人不容剥夺的权利；因而使体育嵌合而不是嵌入（embed not inlay）到社会文化大系统各个组成部分人们生活中，成为一个开放的、多层次的、网络化的，像血管、神经般伸展、渗透到社会有机体各个组成部分人们生活中的通体性结构。

这么看来，在体育的结构朝着这个方向发展的过程中，当然会像舍勒早就看出的那样，它的范围无限地扩大、地位无限地提高。而舍勒和古特

〔1〕（德）席勒，《审美教育书简》第48页

曼指出，“体育的内涵却很少得到严肃的对待”，它“仍位于……最少被理解的现象之中”，“公众对体育熟知似乎使体育的意义显而易见，但事实并非如此”。这种懵里懵懂的情况不能不算是体育和社会文化的一种可悲现象。

如果以上的分析和归纳可以接受，则是不是这也回答了前面对于现代文明的文化提出的问题：现代文明社会内部分层和分工的发展所产生的凌驾于个体和人群之上的资本和权力同人性的自由发展之间的紧张对立，反映在哲学上则是理性主义同人的非理性一面之间自始就存在的紧张对立，而且，在这对立的两极中，前者总是在不断对后者进行挑衅。长期以来，许多人不懂得人是具有非理性一面的，不懂得“人类的辉煌之处，正在于能够凭借本能，但不囿于本能，并超越本能，达到理性升华”。可是，“夸大理性的理性主义”总是对人的非理性一面进行挑衅，更多地方人们把非理性直接视为荒诞无稽、视为“夸大非理性的非理性主义”，^{〔1〕}一概加以贬损、鄙视。因此，这种紧张对立和挑衅当然不利于体育，因而不利于人和社会文化的发展。所以，从最抽象的意义上讲，人类的体育因与人的本能——人的非理性的狂野的身体运动的力能——有着最直接、最紧密的联系，所以它是从人性自由本质根基之处发动的，因而它是人的自由本性对理性主义和社会分工不人道一面的压迫最彻底的反抗。而且还看到，理性主义不人道的一面总是不放过体育，它恰恰是在人性自由本质和人类文化最根基之处，在人的本能和文化最易模糊之处，进而歪曲两者（身体和意识、灵和肉）的关系，从而蔑视和鄙视体育，歪曲和利用体育。于是使体育的性质和地位在人们心目中、在实践中也似是而非起来。因此，如果说要文化自觉，则我以为这也许是今日各国、各民族文化和体育发展中共同面对和需要自觉的一个地方。

五

现代体育不是中国本土文化的产物。今日，我们中国人用汉语“体育”一词所指称的现代社会生活中我们所闻、所见和亲历其中的人的这种活动，从根本上说乃是19世纪中叶以后——在中国先进分子、社会精英为

〔1〕 夏军《非理性世界》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第4页